

广义文字学研究

自选集

黄亚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亚平 著

广义文字学研究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义文字学研究自选集 / 黄亚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61-9500-0

I. ①广… II. ①黄… III. ①汉字—文字学—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31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7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

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

序

这本自选集选录的是 2004 年至 2016 年间笔者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有关广义文字学研究方面的部分学术论文和少量未发表的文章。内容包括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前文字研究、文字与文明研究 3 部分。

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部分收录了笔者多年来探索广义文字学理论的 13 篇文章，是本书的主体，也是笔者自 2004 年首倡“广义文字学”概念以来，不断探索这个问题的阶段性成果的汇集。该部分的讨论围绕“文字起源”问题展开，这既是笔者的研究兴趣所在，也是这本文集的核心内容。

西方现代语言学自 20 世纪传入中国后，对中国语言学学科的确立和理论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各时期各种语言思潮的相继引入，中国语言学的话语体系几乎全部来自西方。毋庸讳言，西方语言学理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学科地位的奠定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有其自身学术背景的局限，他们建立的语言理论较少考虑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的情况。因此，西方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对“语言和文字”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① 索绪尔在言文关系的认识上出现偏差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明确说明“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只限于今天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②。但是，在

①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7 页。

② 同上书，第 51 页。

西方现代语言学引入中国以后，由中国语言学家撰写的语言学著作中，并没有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并及时补充西方语言理论的不足，创建出既能包括表音文字体系，又能吸收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体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反而坚持西方理论，并把它发挥到极致，重点强调“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却很少谈及或干脆不提文字对语言的反向制约和影响，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大部分语言学专业教科书至今还是坚持“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①。这种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自然导致文字成为语言的附庸。当前国家学科目录设置中的文字学只是一个从属于普通语言学之下的三级学科，这应当是国内学界受制于言文关系认识局限的真实写照。

文字只有成为自足的符号系统，进入能够毫无遗漏地记录语词的阶段，才可以说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成熟的文字。史前阶段出现在世界各地种种媒介之上的各类符号表达形式，如实物记事、陶符、刻契、结绳等，只能是史前表情达意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前文字”。前文字充其量是成熟文字体系的符号之源，但并非记录语词的符号。显然，如果我们想要讨论文字起源和文字系统形成的原因，那就必然要回溯到前文字阶段，考虑前文字和成熟文字的符号关系，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以及语言和文字在什么情况下合并在一起的问题。而不能首先限定文字晚于语言，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只能是记录语言的辅助符号。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文字起源”的问题根本无法展开讨论。因此，如果要探讨文字起源的问题，必须首先打破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言文关系所设立的禁忌，关注和思考语言和文字什么时候结合在一起、结合的条件和环境如何是怎样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倡导广义文字学理论建设的意义所在。

前文字研究部分的5篇论文主要讨论文字系统形成之前的史前时期表情达意的方式及其对成熟文字的影响。并具体讨论了双墩符号的构型方式及其符号性质：双墩符号属于前文字，虽然距离成熟的文字系统还有一段距离，但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因此，双墩符号对汉字源头的

① 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7页。

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比较理想的前文字研究材料是所谓的“印第安图画文字”,其中包含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种种表情达意方式,但由于编选本书的时限,笔者对有关印第安图画文字的讨论文章只完成了《美洲印第安手势符号初探》一篇,其余两篇尚未完成,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行补充了。

文字与文明研究部分的2篇文章着眼于讨论文字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文字与文明之间的相互激发扩散,着力探索文字在文明建构过程中,以及在文明的固化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字和文明的互动关系中研究文字体系的形成,这是广义文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字及其书面经典对文化的塑形和整合作用十分明显,以汉字为例,汉字的起源对应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成熟的汉字体系对应于夏文化早期,而经典化过程从商周就已经萌芽,直至孔子的时代才最终完成,这恰好描摹出华夏文明从萌芽到孕育,以至最终成形的全景。

原始文明的不断碰撞和不断重组,民族凝聚力的养成和定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符号层面上的观念性意识形态整合的结果,而文字则是这种意识形态中最为基础的元素。如果我们把文字之前的种种表达方式,尤其是其中的视觉表达方式看成“前文字”,那显然只有前文字才是所有文明或文化所必须具备的。成熟文字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好地交流信息、管理政务和记录账目等目的,补充语言符号的不足而发明出来的符号系统。文字系统出现的根本动力是社会需求,而一种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社会读写机制”的建立才是促使该文字系统迅速传播和推广的制度保障。因此,“文字起源”的问题,如果是指“文字系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或者是指“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什么时候变得成熟了”一类的问题的话,其研究重点应该是对“社会读写机制”的深入挖掘,而不是对符号个体的产生时间以及前文字符号与文字符号形体相似度的不断追寻。没有社会读写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及其对文字的大力推介和广泛应用,没有适当的传授者,没有自觉自愿的学习者,没有推广和考核的措施,文字符号便不可能自己走向市场,并实现自我流通和应用。

“广义文字学”概念的提出,蕴含着我们将卓越的中国文字学研究成

果推向世界的愿望，也蕴含着我们期待世界范围内古文字、古文明研究者更多地重视和关注中国的文字研究成果的努力。显而易见，一种新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奋斗，需要各方面的认同、肯定和参与。从2004年我们提出这个概念算起，我们已经为此做了十几年的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还只能算是刚刚开始，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对我而言，需要用毕生来完成这样一个夙愿！

黄亚平

2016年4月10日

于青岛浮山一线海斋

目 录 CONTENTS

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

广义文字学刍议	3
广义文字学研究再议	
——国外古文字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	15
前文字、类文字、广义文字学	
——三议“广义文字学”研究	24
我们的广义文字学研究	35
论“二次约定”	53
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	58
论汉字身份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意义	68
试论汉字和书法艺术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核心地位	76
汉字的性质及其有关汉字形成的几点假说	93
象形字的几个问题	98
试论“假借表达”与“假借字”的区别	110

社会读写机制的建立和激发扩散是文字系统形成的真正动力 ——以甲骨文为例	117
许慎对中国文字学学科研究体系的创造性贡献	140

前文字研究

史前文字符号研究的基本观点	157
符号学视域的史前文字研究	168
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可能影响	174
美洲印第安手势符号初探	188
东巴教祭风仪式中的木牌画、象形文字和经文诵读	221

文字与文明研究

碰撞与整合 ——为《山海经》投射的中国神话的层级性二元互补结构	239
原解释 ——中国文化的符号化动态结构	267
附录一 大视野下的文字学研究荟萃 ——《广义文字研究》述评	289
附录二 前文字研究方法的探索	291
后记	300

广 义 文 字 学 研 究 自 选 集

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

广义文字学刍议

20 世纪以来,由于地下材料的大量出土和现代科学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与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相比,文字学的研究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深入发展。但是,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却不是 20 世纪以来的文字学研究的巨大成绩,而是现代文字学研究的局限以及我们提出的初步的解决办法。

毋庸讳言,由于受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巨大影响以及语言学研究中对“语言和文字”关系问题的认识局限,文字学界针对文字的研究事实上存在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并且赋予它不证自明的地位。有了这个大前提,文字研究被自然纳入语言研究的羽翼之下而不能自成门户,对文字的研究也只能是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们一开始就将文字逐出门外,宣称文字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①与世界同步的现代中国语言学学科领域中也几乎没有文字学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字学研究也由于不能完全被现代的“语言的”范畴所涵盖,在 20 世纪那个“语言的世纪”里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尴尬状态,较少受到现代语言学的青睐。

从“记录语言的”“成体系的”视角出发研究“出土文字”,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在文字的形义联系和考释文字的具体意义上,而相对忽略了文明早期文字符号具有的文化透射作用,忽略了文字形成期文字符号的神性

^① 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功能，没有意识到将出土文字与相关要素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注意从广义的角度研究文字发生期的相关问题，更没有把文字发生的问题和文明发生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结果必然导致仅就文字而谈文字的狭义的文字研究方法。这种倾向既不利于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符合文明发生初期的实际情况。

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建构文字学的学科体系，则必然把注意力放在文字符号的形体演变上，致使针对汉字的研究花费大量精力讨论已经成体系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的形体结构，即从甲骨文一直到楷书的形体演变。但由于对文字形体变化的研究事先有一个“语言的”前提，并且仅仅局限在“记录语言的”符号范畴之内，因此相对忽略更大范围内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没有意识到若就文字发生的全过程而言，不但文字形成初期的符号构成形式错综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并非仅仅与语言符号发生关系，即便是在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形成之后，文字形体的变易发展也有可能受非文字符号的影响，甚至受文字表达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制约。换句话说，文字符号的构成方式显然并不只受语言符号的制约，而是更为宽泛的符号构成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广义文字学是与狭义的文字研究相对的文字学研究，也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以文字为核心的综合性研究。广义文字学的研究从发生的角度讨论文字是如何被构成的，但它并不致力于找到文字符号的创造原点所在，它把注意力放在揭示文明形成时期的文字与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字构形方式与文明类型的对应关系上。

广义文字学的研究应该时刻关注考古学领域内的新动向，注意吸收考古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成果。比如，在苏秉琦先生关于“区系分际理论”^①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广义文字学的研究认为，针对汉字起源的研究应该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相对应。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把文字发生时期的现象与考古学上的文明类型对应起来研究，并以此为准区分文字研究的历史。比如，文字形成期的文字主要对应于考古文化中的龙山时代和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中华各大考古文化。文字成为“记录语言的”“成熟的符号体系”主要对应于历史传说中的“五帝”末期——尧、舜、禹阶段和有文献记载的夏文化及其后的中华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广义文字学研究应该同时关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既然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华夏文明并不是一个血脉纯正,起源单一的文明体,那么针对这个文明体构成方式及其文字构成方式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

几个文明个体内部，而要加强对其他文明体的研究，并力图从对多个文明体的研究中找出许多文明体之间曾经存在过的交叉、渗透、融合、重组的轨迹来，以便揭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性质。

广义文字学研究还应具有符号学的视角。在文明发生期，文字符号是直接表情达意的符号。文字符号与语言符号相对平行，还没有出现专门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文字与语言的约定相对松散，或者说还没有完全约定俗成；文字的表达方式多样化，文字的构形以写意为主，文字的性质和功能以表达原始人的心智为主。如果说这个阶段对后世“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出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对文字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奠定了为后世所尊存的“象意精神”（其核心是“二元互补”结构），并成为潜在的文字构成的深层结构。这个精神或深层结构规定了文字的创制并不需要全部从头做起，从一个个物象的描摹开始造字；文字的形成完全可以借助永远来自前代各个民族创造的现存符号，所谓创制文字的过程只不过是各个不同文化和相同文化不同分支已有符号的借用、挪移、置换和重新整合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通常所谓的“造字”，并不是全然按照“象形原则”进行的符号创制，更多的则是对前代已有符号的整理和规范。在文字成熟阶段，文字符号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文字成为独立于图画、记号、族徽等视觉符号的符号系统，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语言符号成为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直接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文字则退居其次，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①

二 比较的原则

广义文字学的基本思路决定了它的研究必须坚持“比较的原则”。所谓比较的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境内各史前民族之间的内部比较。既然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史前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存

^① 参见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史前汉字符号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在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几大文明，而且这些文明的内涵也不尽相同，那么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各文明个体的文字符号，自然也会因为文明自身具有的类型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类型。比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系刻符与大汶口、良渚系刻符之间存在的差别就是因为它们的文化类型的不同所致；中原地区出土的彩陶器上的写意型符号与周边地区发现于岩石上的写实性符号之间的差别也可以看成不同文化类型的产物；至于同一个文明体创造的符号，也会随着这个文化的传播而走向各地，因而导致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之内出现相同的符号。^① 其次是立足于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类型的分别与比较（包括文明要素之间的比较），即外部比较。进行外部比较必然要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广义文字学的研究自然要具备文化人类学的背景。只有以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为平台，对中国早期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因素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才能正确揭示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准确描述华夏文明的特征和它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对文明要素的影响，也才能更好地解释汉字形成的过程以及随着它的传播而对其他文明产生的影响。比如，同属“意音文字”，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这些不同的文字体系之间是否存在着若干的区别或者统一？表意文字或意音文字这一大类是否还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中国传统文字学发明的“六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实用于上述这些古文字？^② 这些问题只有立足于世界文化比较的范畴才能说得清，如果仅局限于一个文明体之内，那是没法解决的。

三 关系型的研究方法

如果不事先确定比较研究的双方，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就势必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首先将“文字”设立为一个对应项，再找出可能与

① 参见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史前汉字符号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参见周有光《六书有普遍适应性》，《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